

身體史：一個引人入勝的新熱點

◎ 侯杰、姜海龍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上世紀70、80年代開始，由於受資本主義消費文化日益發達和女性主義論述的影響，「身體」逐漸成為西方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界新的研究關注點。特別是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將「身體」開掘為一個批判現代理性話語的富有衝擊力的思想主題。他的一系列著作諸如《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the Age of Reason*）、《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深入地闡釋了圍繞在身體和生命周圍的政治權力，是如何規訓、懲罰、宰制身體和生命的，確立了一套福柯的研究範式。福柯之後，「身體」研究得到了極大的推進。受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歷史學中逐漸出現「身體史」研究，成為新社會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著名社會史學家伯克（Peter Burke）稱「它與性態史、性別史相聯繫。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後，身體史繼續擴大其研究領域並呈多樣化趨勢，現在其研究包括姿態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別是恐懼史和幽默史」（伯克著，劉華譯：〈西方新社會文化史〉，《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4期）。就身體史研究而言，性史、身體與政治的歷史、身體醫療史、女性身體史是研究較多的領域。主要著作有拉奎厄（Thomas W. Laqueur）的《製造性：從古代希臘到弗洛伊德的身體和性別》（*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杜登（Barbara Duden）的《膚下的女人：十八世紀德國一位醫生的病患》（*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 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伯克本人的《塑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等。

作為歷史研究中新的研究視角，「身體史」一經提出就迅速為海內外的中國史研究者吸收、採納。關於身體史的研究著述愈來愈多。受文化區域得天獨厚的影響，歐美的中國史研究者在身體史研究方面著手較早，成果相對較為成熟。1999年出版的栗山茂久的《身體的表現性與希臘和中國醫學的分歧》（*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費俠莉（Charlotte Furth）的《藩息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別，960-1665》（*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就是海外中國史學界身體史研究的新作。身體史研究在台灣、香港等地也頗為盛行，研究畛域相對集中在醫療社會史、中國古代的氣論、禮教、儒家身體政治觀以及近世情欲觀等方面。

台灣東海大學黃金麟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以下凡引此書只註頁碼），正是身體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黃金麟的這部身體史著作關注的是1895-1937年近代中國身體的形成，多多少少彌補了中國近現代身體史研究專著缺

席的遺憾，因為以往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中國古代及前近代。

《歷史、身體、國家》一書將身體放置於近代中國變遷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貫穿於全書亦是作者想要回答的三個主要問題：我們的身體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變化，才有現今的樣子？這種身體的發展狀態隱含了甚麼樣的歷史特定性與危險性？它能否被當成是一種普遍的、永恆的身體模式來看待？

圍繞這些問題，作者在第二至五章中依次將身體在近代中國所經歷的變化概括為：（一）身體的國家化。作者首先就當時流行於全國的一些教育雜誌如《新教育》、《教育雜誌》、《中華教育界》等所討論的「模範學生」議題，牽引出一個福柯式的命題：中國如何走上規訓身體的道路。從這一命題出發，作者主要透過蔡鍔於1902年提倡的軍國民運動、梁啟超等人在1902-1903年發起的新民討論，以及興起於1923-29年的公民教育運動等，論說在資本主義發展與民族國家興起兩大歷史背景下近代中國身體的建構情況。（二）身體的法權化。作者從晚清沈家本修律到30年代國民政府頒布民法的系統考察中，認定身體在近代中國的律法變更中，也完成了從原有的「家屬」形式到以個人和國家為主要歸屬的轉變。在身體法權化的轉變中，朝野上下充滿了各種禮法爭論，現實社會中也出現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所指出的禮治不行、法治未立的亂局。（三）身體的時間化。從晚清開始，中國的時間觀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世界時間」的採用，以陽曆、耶穌紀年、鐘點時間代替過去中國固有的陰陽曆與時辰表現時間的方法。隨著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新產生的工人階層在工廠中勞動，工人的作息時間必須配合機器的運轉而形成一整套鐘點時間計算機制，使工廠中的勞動者的身體受到嚴密的鐘點時間規約。與工廠中的工人身體的時間鐘點化相比，近代新式陸軍和新式學堂中，軍人、學生的身體也經受著嚴格而劃一的鐘點時間塑造。（四）身體的空間化。福柯在著名的全景敞視主義論述中，將空間視為一種規訓身體的技術。作者也認為近代中國學校、工廠、醫院、新式交通工具、監獄的興起，體現了空間對身體的規訓。不過，作者還認為身體與空間並不是單向的關係，游移的身體也常完成空間的轉化。以五四運動為例，大量的示威、遊行、請願、講演和國民大會，眾多愛國身體的集聚和展演，使原本普通的物理空間諸如街頭、廣場，迅速成為權力角逐的政治空間。作者也指出，學生上街頭遊行得到允許但又經常受到鎮壓，這種矛盾表明空間轉換與身體行動在近代中國社會中的有限性。

綜觀《歷史、身體、國家》一書，強烈的問題意識與良好的社會學理論素養構成其最大特色。與以往的身體史研究多側重於對研究對象的把握和對具體問題的關注相比，黃金麟的這部專著更為注意從一個宏觀和長時段層面上去嘗試。正如作者所說：「我希望透過時間上的拉長，以及事件之間的細微關聯，來凸顯身體在當時所經歷的綿延變化。至於在分析角度的抉選上，我將以宏觀（marco）的方式來觀察和分析身體在這四個面向上的發展……。」（頁9）作者不僅將「身體」視為研究的對象，也將「身體」作為一個新的理論視角嵌入歷史之中，去考察有「身體」的歷史。全書充滿作者強烈的「身體」問題意識和建構「身體」的理論努力。在「身體」視角的聚焦下，原本獨立於政治史、教育史、軍事史、法律史、經濟史的各项議題被統攝起來，完成了對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的闡釋。與此同時，也正是在「身體」視角的串聯下，許多既有的歷史命題獲得了重新認識的可能。以軍國民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為例，作者在「身體」視角下，注意到這兩個在傳統研究中被視為關聯不大的運動，具有相當的內在聯繫。表面看來軍國民運動強調尚武的愛國情操，而新文化運動注重提倡個性自由，其實在深層次上它們都暗含著國家意識對身體的規訓。只不過是軍國民運動強調國家在前、個人在後，與新文化運動主張的個人在前、國家在後的順序不同。作者所選取的論證材料諸如軍國民運動方面的材料、《新民說》方面的材料、晚清修律與民國約法方面的材料，

在以往的研究傳統中，似乎很難歸屬到身體史的研究範圍。但是經過作者精心的問題設計和獨特的「身體」視角觀照，相對大眾化的史料被化為作者身體史論著的基本材料。從這裏可以窺見視角「發現」材料之一斑。

《歷史、身體、國家》一書的精彩之處除卻「身體」視角的引入外，具體論述也相當到位。關於身體時間化與身體空間化的論說既有新意，又富啟發性。在論述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時，國家化與法權化是較為容易考慮到的兩個維度。相比之下，將世界時間的採納與鐘點時間對身體的規訓作為近代中國身體形成的一個層面，顯示了作者相當深刻的學術思考。近代中國時間觀的變遷，其實是一個相當值得深入探討的歷史問題。除卻物理性的時間之外，還有生物性的時間、社會性的時間，以及儀式性的時間諸如婚喪禮俗、廟會祭拜等等。對近代時間觀變遷的探討牽涉到社會生活史的方方面面。作者將身體的時間化視作是近代身體生成的一個層面，值得激賞。至於身體的空間化即游移的身體與空間身體建構的探討，也不乏創新之處。由於全書的探討主題牽涉到身體與政治、身體與現代性的關係，韋伯（Max Weber）和福柯的相關理論既是作者的出發點，也是作者意欲理論對話的潛在對象。在探討身體的空間化時，作者依據福柯關於空間是規訓身體的一種權力技術的理論，概要地論述了近代中國興起的公共空間對身體的塑造。接著一反福柯式的身體規訓理論，強調游移的身體對於空間的轉換和塑造，也具有規訓的作用。以五四運動為例，通過身體與空間之間的複雜關係來透視五四運動等傳統政治、文化史命題，也平添了幾分新意。

不過，筆者讀罷黃金麟這本身體史專著，掩卷而思，也有疑惑和不解之處。首先，這本書的核心概念無疑是「身體」，作者之本意也在說明「身體」在近代被形塑和建構的歷程。通觀全書，「身體」這一概念雖然頻繁出現，但作者並沒有對這一核心概念進行明確的界限和說明。作者在該書開篇中強調：「我將不把精神或心靈，或一般熟知的國民性，當作是分析的焦點，而是將肉體的活動與心靈意志的開發同時當作對象來觀測。」（頁18）可這種分析定位卻相當含糊。在論述身體的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空間化的過程之中，從生活秩序的規訓、梁啟超的《新民說》、公民自治教育運動中的公民，到法律上的人格法權，作者均不假區分地視為身體加以闡釋。眾所周知，在身體史的研究中，「身體」這一概念其實是有相當多層次的，包括生理的身體、社會的身體、文化的身體、宗教的身體、觀念的身體等等，「身體」內涵的豐富性也正是身體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因而身體史研究中對最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把握很有必要，也是能否順利展開論述的基礎。在這部著作中，「身體」所指代的內涵先後有所變化，作者卻沒有將這種變化詳細地闡釋出來，反而給人一種「身體」無所不包的印象。現有的身體史研究似乎也存在著這樣一種通病：「身體」的虛無化和含混化，削弱了身體史研究的獨特性。在《歷史、身體、國家》一書中，身體概念的過度延伸，除了因作者缺乏嚴格限定外，還與其凸顯「身體」的問題意識有關，是作者有意之舉。這就牽涉到如何把握問題意識與所闡釋的歷史事實之間距離的合理性問題。從理論上來講，歷史學家的主觀理論構建既要有創新之處，又不能距離事實太遠而處於漂浮的狀態。

其次，作者這本著作的研究路徑主要是年鑑學派的趨勢化作法。通過對1895–1937年近半個世紀的「身體」歷史的考察，力圖宏觀地描述出近代中國身體的形成狀況。鑑於「趨勢」與「總體狀況」是作者的研究期望，因而作者沒有採用福柯式的對微觀權力機制的考察分析。相形之下，筆者以為福柯立足於對微觀權力機制的考察，讀來更令人容易產生思想的共鳴，令人信服。在論述身體的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空間化的過程中，由於每一個面向都相當複雜，所以作者進行的綜合探討，給人以「議猶未盡」之感。在探討身體與鐘點時間時，關於近代中國時間的演變對身體的塑造作用，作者著墨似嫌不夠。筆者以為在研究中將趨勢

化研究與微觀分析適度結合，對於該書的完美應該有所幫助。

再者，本書將研究時限定為1895–1937年，尚有許多對近代中國身體的形成有重要影響的歷史實踐，作者或一筆帶過，或沒有涉及。如近代軍事化對身體的影響，南京國民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以及中國蘇維埃政權內的身體狀況等。作者也承認「就中國身體在二十世紀的發展而言，它除了經歷我在《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一書中所探討的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和空間化的變化外，事實上還有許多面向是值得我們再去細部思考的」（黃金麟：〈身體與政體：研究二十世紀中國身體的一些線索〉，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20.htm）。作者也在後續的研究中開始關注民國時期蘇維埃政體對身體發展的影響。

總之，黃金麟的這部《歷史、身體、國家》是值得讀的有關近代中國身體史的力作，期待著他的下一部身體史著作的問世。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4年10月號總第八十五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